

华裔文学中的灾害书写*

杨 森

摘 要：对于海外华裔作家而言，中国是其念兹在兹的故土，对于中华民族历史中的饥荒、瘟疫、地震等灾害，也成为他们的书写重心。然而也容易陷入“东方主义”的视角，以一种猎奇式的书写呈现“古老中国”的苦难与创伤，从而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想象。另一方面，华裔作家透过对美国本土灾害的书写，以此反思了资本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并且小说中通过虚构的瘟疫想象，展现了“黄祸论”的幽灵依然徘徊在美国社会当中。而且巧合的是作品中设想随着疫情扩散，美国陷入失序状态的情景。竟然与新冠疫情下的美国现状相契合。

关键词：华裔文学 灾害书写 瘟疫想象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文学作品中也有着数量可观的灾害书写。关于灾害的定义，学界也有了较多的讨论，孟昭华指出：“灾害是由某种不可控制或未予控制的破坏性因素引起的、突然或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超越本地区防救力量所能解决的大量人群伤亡和物质财富毁损的现象。”^①从近现代臧克家《难民》、韩秀峰《无名的死尸》、田涛《灾魂》；丁玲《水》，匡庐《水灾》，蒋牧良《旱》、《荒》，欧阳山《崩决》，洪深《五奎桥》、《青龙潭》等。进入到当代路遥《在困难的

* 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新中国初期大众媒介与基层社会整合研究（1949—1966）”（项目编号19CXW005）研究成果。

①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第54页。

日子里》，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陈忠实《白鹿原》，莫言《红蝗》，阎连科《年月日》、《受活》《日光流年》，阿来《云中记》等，主要围绕水灾、饥荒、旱灾、瘟疫、地震等角度，都书写了中国内地发生的种种灾害。施淑青的“香港三部曲”，描写了香港1894年暴发的鼠疫。也斯、陈冠中、李欧梵、沈祖尧等曾对2003年的非典疫情进行了纪录。在台湾地区，也有着比较详尽的灾害文学，从日据时期的林朝崧、傅锡祺、杨逵，书写殖民地时期台湾遭遇地震灾害时的种种惨状，到后来的“九·二一”大地震、“八八”水灾等。向阳、简媜、林云阁、奥威尼·卡勒盛（鲁凯族）、瓦历斯·诺干（泰雅族）的作品展现了灾害对台湾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目前国内学界对海外华裔文学中的灾害书写关注不多，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些补充研究。

本文讨论的华裔文学范围，指在欧洲及北美社会中的华裔群体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总称，其中包括林露德（美籍）、谭恩美（美籍）、邝丽莎（美籍）、严歌苓（美籍）、汤婷婷（美籍）、马林（美籍）、张翎（加籍）、虹影（英籍）等，当中既有华人混血作家，也有第一代与第二代华人移民。作为侨居海外的华人，中国一直是华裔文学的写作重心所在。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历史中发生的饥荒、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也成为了他们书写的重点。这也塑造了一个贫困、衰弱、落后的“古老中国”形象，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西方社会的“东方主义”想象。另一方面，华裔作家透过书写海外本土的自然灾害，包括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从而展现了当地华人的艰难生存境况。汤婷婷通过书写奥克兰山火，进而反思美国扩张战争对全世界造成的深远影响。以及新生代作家马林在2018年创作的作品 *Severance*（《隔绝》），以纽约为中心虚构了一场改变了美国的大瘟疫，从而反思了现代性的弊端，以及美国社会过度发展的消费主义倾向。并且无意间对应了当下新冠肺炎在美国肆虐的情形，折射出了美国社会机制运行中存在的巨大问题。此外，包括严歌苓的纪实散文《美国疫情卷走了我亲爱的姑姑》，同样对新冠肺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美国作为多种族移民社会，高速

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加速了疫情的传播。

齐伟先认为，华裔文学中的灾害叙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引发惊惧感受的叙事类型，配合死亡人数、灾难数来说明灾难的惨烈程度。二，疏离效果的叙事类型，以客观报道、究责等角度，提醒读者站在审视的立场。三，转化悲愤至反思的叙事类型，引导读者借此抒发自我情绪。四，行动式的叙事类型，提供读者思考后续如何因应的行动架构。^①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华裔作家的灾害书写，包含小说、杂文、纪实散文等多种体裁，进一步探讨华裔文学如何透过以上四个叙事层面进行灾害书写。

一、“他者”视角下的中国灾害

饥饿作为一种无法抹去的文化记忆，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饥荒历史记忆影响了华裔作家的创作，并且相较中国本土作家，华裔作家对于饥荒书写的历史跨度要更大。林露德作为华人与苏格兰人混血的华裔作家，她的作品主要展现的是早期华人历史，尤其是那些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却极为重要的华人。《千金》中主要记录了宝莉·毕默斯的事迹，宝莉·毕默斯原名腊露，作为1872年就前往美国西部的华人女性拓荒者，她充满苦难和奇遇的一生，恰恰反映了早期华人移民美国的艰辛。腊露之所以会前往美国，正是源于家乡爆发的饥荒，面对粮食的短缺，土匪开始进村抢劫，腊露被土匪的头目发现以后，以半抢半买的方式，用两袋豆子的价格将其掳去，从头至尾父亲都没有真心实意地打算解救女儿。面对这个局面腊露早有心理准备：“腊露受过的全部三从四德都告诉她：她必须接受这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只有把她卖掉全家才能活下去。”^②饥荒当前只有牺牲女儿，才能

① 参见齐伟先：《媒体灾难叙事的社会意义建构：日本福岛核灾的戏剧分析》，《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2013年第1期。

② [美]林露德：《千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7页。

拯救弟弟们和全家人的性命。作者对于以父亲为代表的中国农民，更多是抱持着同情心，这些农民身处底层，面对清廷和土匪的双重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的肆虐，却依然保持着农民的韧性：“农民遇上天灾人祸时，他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被土匪、虫害、瘟疫或旱涝灾害糟蹋得颗粒不收时，他们从来不像孩子似的哭哭啼啼，一蹶不振，他们会从头干起。”^① 腊露被土匪以两万的价格卖给妓院，妓院再将腊露转卖到了美国旧金山，腊露如同黑奴一般被要求赤身裸体地站展台上供男性买家挑选。“她认识的美国也绝不是他们描绘的金山。她眼前面对的一切：昏暗龌龊的地下室；被剥夺全部希望的妇女们一张张怅然若失的脸孔；她双脚站着的布满裂纹的木板——拍卖台，这就是她的美国。”^② 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腊露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与机缘巧合，改名为宝莉并在美国西部定居了下来。作者正是希望透过挖掘腊露/宝莉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以此展现这些被美国主流历史所遮蔽的华人移民者。正如作者自述道：“19世纪美国有过很长一段反华历史，其深远恶劣的影响之一，便是书中根本不提这些地区曾有华人拓荒者出没。”^③

另外一部作品《木鱼歌》，书写了饥荒在古老中国的肆虐。作者借心珠的叙述展现了1877年广东台山大旱引起的大饥荒。面对旱灾农民依然要承受地主的剥削：“那一年几乎不下雨，旱灾让收成不好。更糟的是害虫侵袭果园，我每次没能救活一棵树，雇佣我们的地主就扣我们的工钱。”^④ 另一方面，传教士则透过这次饥荒借机传道，为了领取教堂礼拜日发放的大米，面临绝境的农民只能受洗入教。“旱灾之前，他们没办法说服任何我们的人信他们的教。现在因为我们需要米，信教的有好几百个。”^⑤ 这种布道背后充满了帝国主义式的“东方主义”，传

① 《千金》，第52页。

② 同上书，第95页。

③ 同上书，第324页。

④ [美]林露德：《木鱼歌》，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第113页。

⑤ 同上书，第141页。

教士将中国人和印第安人类比，将其视为野蛮落后的原始人，需要靠他们去拯救众生：“希望你们所提升的支那佬有一天能在黑暗的中国为基督做见证。”^①。传教士这样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让农民愈发难以忍受，并且传教士鼓励年轻人砸掉祖先与神位牌，被人们认为是败坏伦常，导致龙王不下雨，最终将传教士赶出了村子。然而旱灾与饥荒并没有好转，祖母和两个侄儿都因灾荒饿死，村子里更是横尸遍野。“到了第三年的夏天，山上都光秃秃的没有野菜和野草；到处都有人饿死。”^②即使在饥荒结束以后，作者依然采用了复魅（re-enchantment）的手法，用一种接近于野史传说的方式，展现了饥荒对村民留下的巨大精神创伤。由于饿死了太多的人，导致众多阴魂不散，落单的儿童被鬼魂攻击而死。直到人们献祭特别的供品，才没有人受到攻击。“举行法事打开恶鬼细细的喉咙，好把甘露送进他们嘴里，平息他们肚子里饥饿的火焰，郑重其事地跟这些鬼魂告别。”^③正是由于家乡资源的匮乏，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因此许多村民背井离乡远赴美国讨生活，《木鱼歌》书写了吕金功这位传奇华人，前往美国后他钻研种植业，最终发明了一种抵抗力极强的葡萄柚，对美国当地的柑橘工业带来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他死后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这展现了吕金功矛盾的一生。

邝丽莎的一部成名作品《雪花秘扇》，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爆发的一场大瘟疫。由于当时村民普遍缺乏卫生观念，每天都在满是虫卵散发恶臭的井水里洗衣服、烧饭做菜，这也导致了疾疫的大范围传播。“一旦我们听说有个孩子染疫，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首先是孩子死去，接着是他的其他兄弟姐妹，接着是母亲，然后是父亲。没过多久，疫情便在县里的每一个村子流传开来了。”^④作品

① 《木鱼歌》，第107页。

② 同上书，第150页。

③ 同上书，第173页。

④ [美]邝丽莎：《雪花秘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98页。

也通过女主角的视角，并结合女主角的亲身经历，展现了疫情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惨痛的打击。同时疾疫的暴发，更进一步地凸显了晚清中国的落后与政府的无能。“屋外堆聚的死尸的腐臭味弥漫在潮湿的空气里，那股难闻的恶臭甚至刺痛了我们的眼睛和舌头。我脑中可以想到和能做的只是——不断地求神拜佛。”^①即使在疾疫最严重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相继死去，人们却是束手无策，作品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刻画了疾疫给“古老中国”带来的巨大伤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邝丽莎笔下呈现的中国多是处在“前工业文明社会”的原始状态之中，是一个充满饥荒、瘟疫横行，灾害肆虐的苦难第三世界国家。这样一种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再现，当中包含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东方主义”视角。

相较之下，张翎则透过重回历史现场的方式对唐山大地震进行了写作，不过张翎并没有只是沉迷于书写灾害带来的伤害，而是更多地将焦点放在了女主角小灯如何进行灾害创伤的重新修复。《余震》的开篇就直接展现了女主角的生命状态，身处多伦多的“小灯”第三次进行自杀呼救。小灯之所以不断地在死亡边缘徘徊，正是源于作为当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地震创伤一直持续地影响着小灯。创伤（trauma）一词源自希腊文，原义指身体的伤口，后来在医学及精神病理学的文献上，尤其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主要指的是心灵的创伤。这场天灾带来的巨大创伤也让小灯丧失了维持正常人际交往的能力，因此小灯不管是与丈夫还是女儿的相处中，都出现了难以弥补的感情裂缝。正如赫尔曼指出：“创伤事件不同寻常不是因为它偶然发生，而是因为它们压制人们去适应生活。”^②张翎正是透过小灯的个人创伤经验，展现了突发的重大灾害对个人带来的暴力性伤害。并且这场大地震不只是造成个人的创伤，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群体性的精神创伤，这也是

① 《雪花秘扇》，第199页。

② [美]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7页。

一个社会发生灾害事件时经常会出现的情形。对此，张翎透过血淋淋的身体意象，进一步展示了这场天灾对人们带来的深刻影响：“后来他们拆开了他的绷带，才发现他的右手从肩膀之下都已经被砸成肉泥，肘部的骨头裸露在外。他一直没有哭，哭的反而是护士——他们已经知道截肢是唯一的方案了。”^①身体的残缺实则指向的是人们心中的伤痛仍然无法痊愈，正如张翎自述：“《余震》是关于疼痛的。一种天灾带来的，却没有跟随天灾逝去的心灵疼痛。”^②这场灾害也构成了人们的集体创伤，正如亚历山大教授对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所下的定义：“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③这也正是一个社会，当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害以后，将会给受灾群众与整个社会带来持久与巨大的精神创伤。并且张翎透过文学的方式重新书写了发生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这也是一种见证文学，透过文化记忆的方式，让人们可以抵抗遗忘，重新记起被埋没的历史。正如鲁迅所说：“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④灾害书写的重要功用之一正是在于可以使用文艺作品的方式，去记载枯燥的历史与数字，以充沛的情感与思想打动人心。

张翎并没有只是一味地沉溺于情感创伤之中，而是透过文学的方式试图对人们进行心灵的治疗。余丰指出：“文学对于个体心理的治疗可以达到放松、疏导转移（移情）、排遣、镇静、消解、娱乐等作用，进而促使人体在生理机能上得以收益。”^⑤包括《余震》中的小灯同样如此，写作一直是她进行自我疗伤的方式。这样一种创伤书写也正是叙

① 《余震》，第30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③ [美]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④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⑤ 余丰：《文学与治疗》，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0页。

事疗法，透过创伤者以讲述的方式把创伤记忆转变为叙事记忆，从而在这过程中将内心的伤痛进行排解，并逐渐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拉卡普拉指出：“将极力抑制的创伤记忆用语言表达出来是从创伤中康复的必要途径。”^①并且这也是创伤者在重寻自我主体身份的一个过程，福柯认为：“语言是权力的代名词，写作是失语者获得权力的一种方式。”^②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创作中以及心理医生的鼓励，让小灯逐渐鼓起了勇气面对压抑多年的创伤记忆，再次从多伦多回到了唐山，透过从加拿大到中国的空间转变，从异乡重新回到了原乡。这也代表了小灯不再逃离，而是回到了创伤记忆的原发地，并将那扇一直关在心底的窗户推开，从而达到了自我与过往的和解。

二、美国本土灾害与瘟疫想象

华裔作家在进行灾害书写时除了聚焦于中国，同样对于自己移民生活的国家抱持着深切的关注。包括汤婷婷、伍慧明、王润华等，分别书写了旧金山的两次大地震，对当地华人及美国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1906年爆发的旧金山7.8级大地震，是美国本土遭受的较早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地震随后引发了大火，并最终造成超过3000人丧生、约22.5万人失去家园、超过4亿美元的财产损失。^③当地华人同样损失惨重，唐人街几乎被烧成了废墟，大量华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这场大火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于大火烧掉了市政厅档案和人口记录，许多华人声称资料被毁重新获取新身份，并在登记时号称在中国有儿女，从而将新身份卖给中国乡亲。因此许多乡亲花钱购买假身份移民美国，成为人们所说的“纸儿子”。汤婷婷《女勇士》、

① 转引自夏婉璐：《身份、创伤、符号：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谭恩美研究》，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6页。

② [美]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65页。

③ 王志永：《化危为机：1906年旧金山灾难与华人社会的变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85—94页。

伍慧明《望岩》都书写了这群“纸儿子”在美国的艰辛生活，尽管借由旧金山地震的契机来到了美国，却不得不从此过上了矛盾分裂的生活。面对美国移民局的严厉追查，每个华人都风声鹤唳担心被遣送。正如陆薇指出：“‘遣返’一词是伍慧明一代华裔美国人从小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词，成为了时隐时现的幽灵。遣返意味着在异国建家立业的梦想从此破灭，而不被遣返意味着他们将永远生活在谎言和被遣返的恐惧之中，两种结果都不能不说比死还要痛苦的生存状态。”^①作者正是借由这场早期大地震带来的意外状况，以此展现了美国华裔的身份困境，一方面他们无法也不愿回到中国，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也在不断地对其进行排挤，因此不得时常处在一种“无根”的漂泊状态之中。旧金山作为地震频繁的地区，时隔多年后1990年又爆发了强力地震。王润华在散文《旧金山大地震之后》，记录了地震之后大批流浪汉尤其是年轻人流落街头，“这批年轻人精神道德、尊严与羞耻感已被震裂。他们迷失做人的方向，失落在街头、公园、广场，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堕落呈现在最威严的旧金山市及加州政府办公大楼广场。”^②王润华更是将这场地震视为一场隐喻，指向的是美国文化、经济的地震与人心的断裂：“被许多人看作天堂的美国，金融经济引起大地震，全美国的老百姓也被这场经济地震震荡得恐慌起来，这种打击把他们的‘美国第一’尊严震得破碎了，有的人再也找不到额头上的优越感。”^③相比于汤婷婷、伍慧明着重于书写1906年旧金山地震中的华人境况，王润华则透过1990年同样发生在旧金山的大地震，展现了美国不再是人们眼中的天堂乐土，以及美国社会发展中暴露的种种问题。

汤婷婷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透过一场与其生命历程密切相关的火灾，重新思考了美国霸权发动战争对于人类的灾难性影响。1991年奥克兰山区发生了大火，造成了25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外出祭

① 伍慧明：《望岩》，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第2页。

② 王润华：《把黑夜带回家》，台北：尔雅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③ 同上书，第9页。

父的汤婷婷幸运地逃过一劫，然而不幸的是她的房屋、财产，尤其是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呕心沥血写作的156页书稿全都付之一炬。这场火灾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打击，甚至一度患上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然而借由这场火灾也让汤婷婷产生了新的思考，她将这场大火视为是死去的父亲对自己的告诫与鞭策。只有自己也亲历苦难，才能真正地产生同理心体悟到人间的苦痛。对于这场火灾汤婷婷自述道：“一个女人若要写一部和平书，就得先知道何谓摧残。”^① 奥克兰大火成为了汤婷婷新的创作契机，并由此写作了反战作品 *The Fifth Book of Peace*（《第五和平书》）。小说共分为四章，标题来自中国文化的五行说，分别是“火”、“纸”（木）、“水”、“土”。第一章“火”讲述正是她自己遭遇的这场火灾，当她站在房前看着大火将所有一切都吞噬以后，“火”带有攻击性并将一切进行毁灭的意涵，这也让她想起了美军发动的伊拉克战火。“我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场大火，上天想让我们看到伊拉克的景象。上天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城市化为灰烬，看到这个类似战争的场景。”^② 因此汤婷婷将这场大火灾害，视为上天对美国社会与美国人的惩罚，并指出相比于火灾，美国发动的战争给人们身体与心灵带来的伤害要大得多。汤婷婷正是透过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中主角阿新的经历，希望以此唤起大众的反战意识，并对美国强权进行了批判。

对于瘟疫传播的想象与书写，也是美国华裔作家灾害写作中的重要一环。原籍福建后来随家人移民美国，如今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华裔女作家马林（Ling Ma）在2018年写作的 *Severance*（《隔绝》）^③，以虚构的形式设想了一场世界大瘟疫的扩散，并进而彻底改变了美国历史进程的小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暴发，这本小说也再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包括严歌苓写作的纪实散文《美国疫情卷走了我亲爱

① Kingston,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New York: Vintage, 2004), p.2.

② Ibid., p.25.

③ Ling Ma, *Severan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p.26.

的姑姑》，则以姑姑的染病离世展现了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肆虐，并对当地华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non-us）、异族等同起来：“污染者总是邪恶的。”^①例如，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中国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也时常被进行污名化。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种排斥由来已久，从早期美国大众文学中的“黄祸论”，到后来的“傅满洲”形象以及英国作家席尔的排华三部曲，都深刻展现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

正如小说的名字可以翻译为“隔绝”，人们对于深感恐惧的区域筑起了无形与有形的边界。西方世界透过禁止亚洲人入境，在海外黄皮肤的亚洲人都成为了他人歧视、憎恨的对象，华人更是首当其冲被认为身上天生都带有病毒，这样的种族偏见在极端的疾疫面前再次突显。小说中美国等世界各国纷纷停止往来中国和亚洲的航班，并禁止亚洲公民入境。排除、封禁和污名化，这种边界的管制和建构，蕴含了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权力/空间运行体系。“那便是排拒（exclusion）措施本身的意义，这个顽固不去、令人生畏的形象在社会群体中的重要性，人们在排除它的同时，亦必定在它四周划上一道圣圈。”^②这样的情形同样发生在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之中，这样一种将中国视为污染源与瘟疫传播者的潜意识，一直都潜藏在西方社会的集体心理之中。从早期的麻风病治理过程中，殖民帝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国，就将中国人视为传播麻风的主要携带者，在其领地的移民政策上针对中国人（尤其是苦力），实行种族主义的论述与排斥政策。^③东

① [美]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② [美] 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台北：时报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③ 刘绍华：《中国麻风病治理的科学主义与政治仪式》，《台湾人类学刊》，2013年第6期，第35—64页。

方主义的核心本质正是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关系，通过形塑一套关于东方的话语系统，以此来定义有利于西方的东西方关系。“东方主义是对权力的声明，是对相对绝对权威的要求。”^①

马林也关注到了在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中，病毒的扩散更是以倍速增长。这也正是得益于现代性的高速发展，借由现代交通网络，全世界已经紧密地连接成为了一个整体。小说中展现了疫情借由现代交通进行快速传播：“病毒往往在沿海地区移动最快，因为沿海地区有大量的贸易、航运和进口。”^②同时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人口的高速流动更是有利于病毒的传播。鲍曼在《流动的现代化性》中提及，资本以光速的方式在全世界扩散，同时人们借由现代交通工具可以进行远距离不同空间的快速迁徙。现代时间的割裂形成了空间的聚合，这也使得出现了在某一个时间段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而这些汇集于一起的人口则形成了人流。在城市空间中随处可见大量的人流，出现在公车、地铁、商业中心、住宅区等各个角落。人流是一座城市的最基本特征，也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作为典型的现代资本城市，汇聚了大量的人流与高速的人口流动，全球化背景下反而成为了病毒快速传播的有利条件。小说也借此对现代性的发展进行了反思，高效率的现代性也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带给人们便捷生活的同时，却也使得病毒的传播更加地迅猛。并且也让人们开始警醒：当我们不断沉迷于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认为现代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以一种线性进化观不断高速狂飙之时，借由这瘟疫自然界也在迫使人类放缓脚步，重新对自我进行思考。正如本雅明对一味地讲求进化观念提出的质疑：“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证。在历史进步、文化繁荣的天方夜谭中，人们忘记了进步对物性自然和肉体自然的残害和暴虐。”^③当人类科技过度发展对自然造成威胁时，自然也会反作用

① [美]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90页。

② Severance, p.59.

③ [美] 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85页。

于惩罚人类。这也形成了一组矛盾，当人类不断完善现代化试图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同时，周遭生存的环境却反而变得更加恶劣。

尽管医生很早就声称，如果美国想避免疫情的大规模扩散，那么就应该隔离整个地区，尤其是在感恩节、圣诞节等节假日时期，大家不要出行在家进行隔离。然而人们并没有听取医生的意见，最终导致了疫情的蔓延，以纽约为首的美国社会彻底陷入瘫痪，洛克菲勒中心、卡内基大厅、林肯中心等地无限期关闭，美国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死城。瘟疫疾病在文学中经常被比喻为“非自然”的元素，不但破坏人类生活与健康的状态，也破坏会秩序的平衡，因此经常被引申为“社会失序”的比喻。作者正是透过瘟疫疾病的隐喻书写，展现了后“9·11”时期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秩序失控危机，这也是当下美国人的集体焦虑。严歌苓的纪实散文《美国疫情卷走了我亲爱的姑姑》，更是以姑姑的逝去为切入点，展现了西方社会提出的“群体免疫论”，最终伤害的是抵抗力较低的年长者：“那个在饥荒年代通过香港朋友给我们寄来香肠、奶粉的严家最不受待见的二小姐，在一个瘟疫横行、春风沉醉的日子里永远闭上了眼睛。这病毒对一个体格健壮，免疫力强的人，也许就是一点疲劳感，一点嗓子不适，而一旦接触姑姑这样的老人，对于老人就是终极劫数。”^①同时严歌苓也关注到了，随着疾疫的扩散，只会进一步加强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对立：“疫情终于喷发出不可视的蘑菇云，炸断了国与国，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的通道。”^②因此疾疫带来的疾病伤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在于疾疫进一步加深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正如罗洛梅指出：“冷漠与缺乏感觉，同时也是防卫焦虑的一种工具。当个人不断地面临他所无力克服的危机时，他的最终防线乃是避免去感觉这种危机。”^③

① [美] 严歌苓：《美国疫情卷走了我亲爱的姑姑》，《世界华人周刊》，温哥华：世界华人周刊出版公司，2020年4月15日。

② 同上。

③ [美] 罗洛·梅：《爱与意志》，杨韶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6页。